



名人与庐山别墅系列故事之一

两个名人与庐山的一栋别墅

■ 贺伟

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在庐山住的别墅也很有特色。张学良1934年夏季来庐山,下榻“雷格里尔”别墅。这栋别墅位于普林路上,建于1921年,面积为239.4平方米。它的最早主人是雷格里尔——一个人了美国籍的英国人。这栋别墅在庐山的别墅群中可谓独树一帜,极有特色。

最有特色的是别墅门厅上的球形屋顶,庐山的别墅中再也找不到同样的屋顶。当你沿着普林路的石阶缓缓而上,远远的,就看见万松翠绿之中,盛开着一朵鲜艳娇嫩的莲花,美得让人眼睛一亮,美得让人心旌摇曳。当你走近时才发现,这朵鲜艳娇嫩的“莲花”原来是一栋别墅的部分屋顶。你不能佩服建筑师别出心裁的设计:充分利用别墅的较高位置,采用球形门厅屋顶,以刺激人们从远处上望的视觉而产生急于走近别墅的欲望。

雷格里尔别墅1930年换了新主人,新主人是中国人,给别墅起了个名字:莲花山房。看来这位新主人极有艺术修养,深知此别墅在设计上的独特妙处。1934年,这栋别墅为国民政府收购,用于高级接待用房。

1934年7月21日,张学良上庐山,下榻此处。他一走近别墅,就不禁连声称赞。

然而,别墅虽好,却无法消除张学良心中的烦躁和焦虑。

1931年,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蒋介石接二连三“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丢失了东三省,心情极为沉重。他命令东北军在山海关驻扎,随时待命,打回东北。但蒋介石面对张学良一次次含泪恳求,拒不理睬,1934年1月又强行要他去武汉兼任鄂豫皖“剿匪”司令,调动东北军南下“剿匪”。

“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在日夜盼着子弟兵入关,自己却要调东北军南下打中国人,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张学良气得动不动就摔东西骂人,加上武汉夏季特别燥热,心里都快要着火了。随从建议他去庐山避暑,并暗示在庐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蒋介石。张学良这才上了庐山。

庐山的风的确很凉,张学良的心却凉不下来。他一次次走进蒋介石官邸“美庐”,看到的却是一派极为忙乱景象,蒋介石正在忙于指挥第五次围剿红军,根本不理解他要打回东北的请求。张学良失望之极,国共之间仗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双方的伤亡越来越惨重,消耗的国力、财力也越来越巨大。外寇都欺



负到头上来,还干着这种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

张学良常常行立在别墅前,久久地凝望着远方:滚滚的长江像一条绸带在天边抖动,江畔纵横着良田万顷,幕阜山脉逶迤在迷蒙的云雾之中。多么壮美的河山啊!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在庐山放声歌唱时,祖国是多么强盛,雄踞于世界的前列;而今,山河依旧,国家却衰弱倾颓至此,屡遭外寇欺凌!哪一个炎黄子孙能无动于衷,何况是一个军人,一个手中握着重兵的军人,却不能驰骋疆场,驱逐外寇,为国雪恨,其情又何堪,其心又何安啊!

7月下旬的一天,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的63军军长冯占海等几名东北军高级军官前来莲花山拜会张学良,张学良在别墅设便宴招待他们。餐桌上备有美酒,但张学良说:今天谁都不能喝酒,你们每人带两瓶回去保存。什么时候,咱们东北人能杀回老家,赶走日寇,诸位再拿出酒来痛饮,一扫我们心中的愤恨。张学良说着,不由热泪飞溅,军官们也个个热泪横流。老部下离去时,张学良一直站在别墅前,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热泪再次盈上了他的眼眶。

1946年7月的一天,莲花山房前久久地佇立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面对着12年前经常出入的熟悉的别墅,宋子文心中不由百感交集。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宋子文、宋美龄冒着巨大风险飞抵西安,恳请张学

良释放蒋介石。宋氏兄妹与张学良相交多年,甚为融洽,亲如家人。宋氏兄妹以自己的性格和多年与张学良挚交的情义保证,只要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决不会让张学良受到任何制裁和磨难。张学良在周恩来的斡旋以及蒋介石答应抗日下,同意释放蒋介石,并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杨虎城苦劝张学良不可去南京,张学良笑着说宋氏兄妹的担保,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谁知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并交给军事审判庭审判。宋子文、宋美龄大惊,连忙找蒋介石交涉,要他承诺在西安作出的决不会追究张杨的责任,决不会限制张杨人身自由的保证,但此时的蒋介石又怎么会再听宋氏兄妹的呢?当宋子文沉重地去探望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张学良时,面对“盟弟”责难、怨悔的目光,宋子文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12年过去了,重返庐山的宋子文面对熟悉的莲花山房别墅,怎想不到还在贵州大山区里艰难度日的少帅,愧疚再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而他偏偏又被安排入住张学良曾住过的别墅,这叫他如何能心安。报应,真是报应啊!这种愧疚伴随了宋子文的后半生……

莲花山房至今还是那么端庄典雅,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给它留下太多的痕迹。也许,知道它与张学良有关联的人越来越少,但美丽超群的莲花山庄应该不会忘记:1934年,一个中国军人佇立在别墅前,热泪盈眶地眺望远方的情形……



李渤与江州

■ 吴圣林

李渤,字澹之,洛阳人,自幼博览群书。唐贞元元年(785年),与兄李涉在庐山白鹿洞、栖贤寺一带隐居读书。

李渤驯养了一只温驯可爱,颇通人性白鹿。这只鹿常随主人外出游玩,而且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购物,常常跋涉到20余里之外的南康府(今江西省庐山市)为李渤买墨沽酒,投书送筒。李渤每次要购物时,只要写张纸条,把银两放在挂在鹿角上的竹筐里,白鹿就会如数购回,因此被山民们视为神鹿,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将他隐居的地方称之为“白鹿洞”。

隐居庐山时,李渤还优游于山水林泉之中,遍访名胜古迹。考察湖口石钟山时,在深潭得双石以考“石钟山”一名之由来,写下了《辨石钟山记》。唐长庆元年(821),李渤任江州刺史,到任不久,发现朝廷管理财政的官员张叔平,不顾百姓疾苦,竟奏征贞元二年(786年)逃户欠款4401贯。他体察下情,为民请命,立即上书陈奏“江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已早死一千九百多顷”,还要征收三十六前的拖欠,黎民百姓实在负担不了。并在书中表示:

如不准奏,“臣既上不副(符合)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在李渤的恳切请求下,朝廷才下旨:“江州所奏,实为诚恳,若不蠲容(免除),实难存济(钟山顿),所诉逋欠(拖欠)并放(免收)。”债务虽然免了,但早情并没有解除。当时,江州城南有一湖,面积约一千二百亩,东抵北风嘴,西至滨兴洲,南接山川岭,北依浔阳城。实际上这就是一块湿地,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满天星光,故时人称之为景星湖,由于湿地宽阔,给南来北往行人造成诸多不便。再加上早情依然,李渤决定在湖之西侧筑起一道七百步(约二里)的长堤,南连琥珀山,北接浔阳山路,以沟通南北交通,方便行旅之人。堤上还建桥安

闸,控制和调节水位,有利于农田灌溉和水上航运。这一利好工程,极大地惠及到江州百姓,人们为感恩这位父母官,特将景星湖改称为甘棠湖,称李渤筑的堤为甘棠湖堤。

然而,许多九江人往往把湖中间的小坝(即南门堤),说成是李渤的甘棠湖堤。清同治《德化县志·水利》甘棠湖堤条目录:“李渤筑,即今新坝”。而在南门堤条目下是这样记载的,南门堤即胡公堤,又叫小坝,是明末清初的司李宗虞所筑;而今天的庐山路,又叫新坝,是李渤所筑,叫甘棠湖堤。

话说回来,李渤对年轻时隐居读书的白鹿洞十分眷恋。他任江州刺史后,对白鹿洞旧居进行了修缮,广植花木,增置亭榭,扩充规模。从此,白鹿洞遂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也为庐山国学和白鹿洞书院创建奠定了基础。

李渤是一个热心办教育事业的官吏。他在江州任上,除了恢复白鹿洞的旧居以外,还创办了景星书院和李渤书堂。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在甘棠湖畔赋诗赞扬李渤“读书匡庐中,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对虚榭。红叶纷欲落,白鸟时飞来,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泻。”清顺治德安知县马士宏有《题李渤书堂》诗:“江州刺史有书堂,幽栖群峰绕夕阳。蝌蚪水田池漠漠,云烟鸟迹晚苍苍。当时白鹿高贤去,无恙青山古道长。父老何人知旧迹,担囊又问使君乡。”

李渤在江州执政虽然不到两年,但江州的百姓对他的政绩却有是感念不忘,在江州人民的心目中,李渤的人格是多元的,他既是文化名人、诗人、学者,又是封建王朝的名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因而纪念他的设施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甘棠湖、甘棠湖堤外,还有烟水亭中的五贤阁,南门湖堤上的思贤桥,以及白鹿洞书院的先贤祠等。

都府巷与督府巷

■ 张廷

督府巷起自大中路,止于柴桑支路;南北走向,全长135米,路宽7米,沥青路面,系居民区。有传说: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大将军驻营于此,曾在此建都督府,衙门前官道以“督府”名之。

历史上,督府巷,旧称都府巷,曾经一度改称柴桑路、卫东路,谐音别称豆腐巷。都府巷的位置与地名,自古就零星记载于地方志内。如《康熙九江府志》载:“都府巷,在丰储坊都察院前。”《同治九江府志》载:“濂溪书院坊,在都府巷口。”《同治德化县志》载:“自(东)大街折而北……为都府巷,俱路通望京门(九华门)。”倘若我们将这些史料串联起来考证,那么你就知道,早在明代初期,从东大街(今大中路东段)转进都府巷,首先便见到丰储牌坊(今都府巷22号门前),穿坊而过就到都察院(今军分区大院)。

都察院系名明初设置的官府衙署,丰储坊也建于明朝初期。到嘉靖年间濂溪书院也移建在牌坊东,并改名丰储坊书院,而牌坊遗迹一直保存至1955年前后才被拆毁。至于督府巷的得名,并不能直接表明与所谓“周瑜都督府”

有联系。如果是由明初“都察院”衙署前的巷道而得名都府巷,就十分符合地名称呼规律,而且顺理成章。

现存九江明、清地方志书中均无“督府巷”的记载,只有1932年出版的《九江指南》说:“市区街巷,或仍其旧,或已换名称,如督府巷。”就此推断,都府巷一度改称督府巷,柴桑路,又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改称卫东路。待到1980年恢复旧地名时,“督府巷”才正式作为门牌置于各家各户。

“督府巷”名称的由来,也可能与另一段历史事件相关。辛亥革命九江光复,李烈钧、罗惺予、林森、蒋群等立即组建九江军政分府,因最高长官为都督,故又称“都督府”,其临时驻地正是明代的都察院,清代的九江镇署故地,而门前街巷旧称“都府巷”,破旧立新之际改“督府巷”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在九江方言俚语中,“都府”“督府”“豆腐”字音读来相同,而且颇为绕口。所以坊间习惯谐音转意,常将老“都府巷”与新“督府巷”读成“豆腐巷”,据此也新编创作了几则民间传说流传一时。



文物 能说话的历史

——写在“国宝档案”开栏之时

■ 汪建策

岁末年初,当我打开九江地区馆藏文物数据库时,数以万件(套)的馆藏文物名录跃然在我的眼前。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宝贝”,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因为它们陪伴着我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

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文物”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遥不可及的东西了。盛世收藏,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厚实自我、丰富生活的一种精神追求。它是物质生活丰富后的必然表现,印证了先哲管子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朴素道理。

感谢九江日报《长江周刊》专门开辟“国宝档案”这个栏目,并邀请我做栏目主持。通过这个栏目介绍九江现有国宝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让读者领略九江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九江,这个位于赣北之地,长江南岸的重镇,因其占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文物遗存,在江西都称得上是“先行者”与“富有者”。从九江十余家国有博物馆所收藏的各类文物看,类别较为齐全。时间跨度上溯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所藏的文物,既有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的一、二、三级珍贵文物,又有堪称“国宝”级的重点文物,文物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在江西都算得上是“文物大市”。

一件文物,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些文物既有各个时代中国文物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地域文物的个性表现,是中国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晋“东林寺乞米”灰陶罐,它既有同时代中国灰陶工艺制作的共性,同时又有九江名刹“东林寺”对这件器物用途的指向性,附着在器物上的“东林寺乞米”铭文告诉我们,这件千年前的历史文物,曾经是东林寺僧人用来“化缘”与“施舍”的专门器具,它讲述了一段1700年前僧俗之间往来对话的往事。又如,已经被历史尘封了的传统照明用的植物油“瓷灯”与近代兴起的以矿物煤油为燃料的近代“马灯”,表象的背后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更能够折射出东西方之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历史与人文旧事,在无声地讲述着它们的曾经与过去。那些远逝的历史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叩问,还其本来的“真身”。这也许就是“文物”的魅力所在吧!

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九江就有先民活动的遗迹:修水的“山背古文化遗址”,不仅发现了赣北远古时期人类活动的居住实例,还出土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为我们厘清和研究赣北地区历史文化源流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1988年发现的瑞昌铜岭铜矿遗址告诉我们,长江流域是中国古老铜山和铜冶遗址的集结地。铜草花下深藏的宝藏为商周青铜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铜的根基,也让九江成为朝廷的造币厂,有了财富符号的象征意义。

随着西汉初年江西行政区划的设置,豫章郡及其下辖的十八个县,奠定了江西地区早期的行政雏形,拉开了江西城池

史的序幕。两千多年来,九江从柴桑、浔阳、德化一路走来,因其扼守军事要冲之地,其间又有过“溢口”、“半洲”的城池称谓。自然造化,恩宠于斯,名山,名湖,名江,名城相汇于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无法绕开的地方。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九江总能够在这川流不息的长河中,不时地激起几朵耀眼的浪花。一件件看似冰冷却饱含温度的文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九江千百年来历史演进、重大事件、人文风情,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艰难与辉煌;从绵延不断的文物遗存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古居民的劳作身影和生活炊烟;青砖灰瓦,纺轮网坠,铜镜石砚,油灯瓷盏,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千年发展的生活画卷。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部不加修饰却很真实的历史教科书,是乡愁永恒的生动记忆。

